

□何 宣

宏观调控必须有一个良好的 微观基础

宏观调控无外乎是调整供给或者需求，达到供需总量平衡、结构合理的目的。但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却一直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孰执牛耳的争论。先从强调供给、主张自由的理论线索来看，早在 18 世纪中叶，亚当·斯密就把国民财富作为《国富论》的研究对象，阐明和揭示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也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价格的变动。在他看来，假如消费的速度大于有保证的有利可图的积累速度，继续积累的动机就会消失，造成资本积累减少，同时又会造成“非生产性消费”。到 19 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家萨伊则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供给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提出了所谓的“萨伊定理”，认为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如果一种产品过剩，只是因为别的产品过少，或者说正是由于某些产品过少，别的产品才能形成过剩。所以，与其说是生产过剩，不如说是生产不足。以后的穆勒和马歇尔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继承了萨伊定理。

再从强调需求管理的理论线索来看，早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浪漫主义者西斯蒙弟就不同意把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应以收入或分配问题作为研究中心，极力把消费提到首位来，要求生产服从于消费。马尔萨伊也认为：“过度热心的积累必然导致商品的供给超过社会习惯所允许

的消费。”

从历史演变顺序来看，尽管西方经济学一直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孰执牛耳之争，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萨伊定理始终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支配性地位。直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强调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才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正宗”地位，并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直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过分片面强调需求管理，导致“滞胀”的出现，供给学派的登台，才使得西方宏观经济调控实现了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的回归和转变。

从此以后，西方宏观调控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发展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从实际中深深地体会和认识到，任何经济政策都是一把“双刃的剑”，宏观调控只有供给管理不行，只有需求管理也不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必须有机结合，宏观与微观必须有机结合。换句话说，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

二

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源于 19 世纪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的结合。在公司从事多方面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管理只能交由专业人员来负责。于是，公司制企业就从旧时的企业主企业演化为现代的经理人员企业了。据钱德勒研究，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成长过程可从两方面把握：“一是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二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过程。”另外，对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成原因，还存在“垄断学派的解释”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现代企业组织的生产是由于企业追求、维持和加强其在市场的垄断地位，后者根据科斯市场和企业是执行两种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思想，从交易成本出发，认为现代企业组织成长意味着行政协调机制对市场机制的

替代。而且，与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现代企业从小规模发展到较大规模，但又没有限制地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企业规模是交易成本和行政管理费用均衡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过程，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本世纪 30 年代基本完成。而 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自由竞争被以企业规模扩张为表征的垄断所替代的时期。众所周知的是，垄断的形成也几乎同时宣告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开始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股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部门中造成垄断，要求国家干预”。“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生产过剩”，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生产……”。可见，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成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产生在原因与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共同点与一致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资本主义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国家干预真正确定以前，经历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微观基础这样一个过程。

三

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供求平衡。长期以来，我国的供求失衡是由于相对于需求的供给不足引起的，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效率太低。比较而言，需求管理时效性较强，一般在短期内（6 月 ~ 8 月）将发生作用，而供给管理则属长期手段。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除从现实性出发外，最根本和最长久的办法应致力于供给管理。总结改革 18 年来的经验不难看出，由于企业改革滞后，我国的宏观调控陷入了较松的财政与金融环境将导致通货膨胀，而较紧的财政与金融政策则有可能使大多数企业陷于困境的两难选择。聚焦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由于坚持了适度从紧和适时微调的方针，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降温过程中仍然保持了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在缓缓下降

中仍然保持了高位。然而由于经济的周期性矛盾、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交互作用，宏观经济三个方面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变化的不适应。最为明显的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旺，市场的结构性过剩特征更加鲜明。从云南的情况来看，潜力最大的农村市场即期需求不足，由于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购买力增长乏力。据测算，1997年农民出售粮食综合平均价比上年下降10%左右，因而造成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减少，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幅预计将比上年降低。购买力较强的城市市场也未出现新的消费热点；从投资需求看，云南省投资率多年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996年比1995年减少了4.1个百分点，其中更新改造投资增幅甚至减少近20个百分点。投资需求不旺，不仅影响到投资类产品需求的扩张，而且导致就业和居民购买力相应减少。从出口需求看，近两年连续出现内贸和边贸双滑坡的严重局面，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强。而来自外部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劲，云南省内市场受到外埠和国外产品挤占，导致省内每年有数十亿购买力外流。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生产结构的不合理暴露得更加突出，生产结构的调整远远不适应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上述情况的形成，静态地看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卖方市场条件下所形成的生产结构的必然结果，动态地看是历史形成的这种生产结构的调整必然需要一个过程，从深层次看这种调整不但需要外在的压力，更需要内在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必须通过改革来寻求和激发。

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矛盾，突出表现为资金特别是信贷资金供应紧张，供求矛盾十分尖锐。资金问题是制约云南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从总量上看，国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信贷政策，贷款的增长受到规模的控制；从结构上看，信贷增量主要投向大

中城市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量大面广的小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争取增量投入的份额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政策上看，国家实行的规模控制和上级信贷审批权限等，对云南省这样高于 200 多亿元的存差省极为不利；从操作上看，银行加紧收回再贷款和其它贷款，再加上上缴两级准备金，购买国家金融债券，国库券贷款等，所增存款集中的份额较大，而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为银行承兑汇票、短期融资券的管理更趋规范，使用受到限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企业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现在不少企业反映由于资金紧缺，生产经营处于困境；而银行则由于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金融形势步入险境，特别是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如何规避金融风险成为银行面临的一大课题；从地方政府来看，由于在银行商业化及企业改革中出现错位、摩擦，特别是企业破产增多，使银企关系出现僵局。

三是企业与政府、社会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企业改革对政府、对社会构成压力和要求上。当前最棘手的是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破产改组重组企业增多，人员分流压力加大，这部分人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严重困扰着多级政府。下岗人数增多是需求结构制约生产结构的必然结果，是长期以来被掩盖的失业和下岗问题的显性化。企业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高强度、大面积的推进，无疑对上层建筑的改革、对政府职能的转换提出更全面、更迫切的要求。面对企业改革产生的强烈冲击，各级政府的配套改革和职能转换显得滞后，如不能适应新体制下企业的行为方式，就很难把握宏观调控的时机、方向、方式和力度。

上述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但补上重塑微观基础这一课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可以作一个形象的比喻，经济发展就象房屋的建设，微观基础就象高楼的地基，只有具备坚实的基础，才能建设起宏伟的高

楼大厦。

四

我国以供给管理为中心，根据现实主义原则来进行宏观调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是一次调节，政府调节是二次调节，政府只应管市场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和事情。经济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们既不能幻想让市场需求来适应供给，而只能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手段，加快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也不能幻想放松银根来扩大生产，而只能着眼于全面的制度创新，开辟间接融资渠道以外的新的直接融资渠道，争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提高整个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政府来说，也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丰富和变化调控手段，转变行为方式，干好政府该干的事，为企业的改革，为新体制的构造和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 重塑我国微观基础，应着力建设八大体系：（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18年改革的实践证明：由于非国有经济增长高于国有经济，因而哪个地区非国有经济比重高，哪个地区发展就快。换句话说，所有制结构调整完善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和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不仅要通过发展多种形式所有制从外部来调整，更要通过国有经济内部所有权的重构来实现。（2）以资本为纽带，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来的基层企业三个层次构成的新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和营运体系。重中之重的是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真正实现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在这一点上，日本许多企业通过相互持股，使股东转化为一个经营者集团的架空机制，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借鉴。（3）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要素市场为支柱，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运行、内外兼容的市场体系。（4）以市场为基础，开放式、可控型的价格体系。（5）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系。（6）社会救济与个人保障相结合的、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7）以中介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8）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

3、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是，我们是重塑微观基础和微观机制的再造，应吸取西方国家片面强调供给管理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好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

□ 潘绍慧

试论云南省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经济的特殊性

云南是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的缩影。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 56 种民族中，云南省人口在四千人以上的就有彝、白、哈尼、傣、壮、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景颇、藏、布朗、布依、普米、阿昌、怒、基诺、德昂、蒙古、水、满、独龙等 25 种少数民族，其中白、哈尼、傣、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布朗、普米、阿昌、怒、基诺、德昂、独龙等 15 种少数民族为云南省所独有。1995 年末，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 1401.4 万，占总人口的 35.1%，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七分之一，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共 8 个自治州 79 个自治县（市），占全省县级总数的 62.2%，约占全国民族自治县数的八分之一。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占全省的 70.2%，总人口占 50.1%，各种主要指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0 年代以来虽然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仍旧维持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显然难以使其进入到与全国、全省同步发展的行列。在 1994 年经国务院确定的全国 592 个贫困县中，云南占 73 个，而民族自治县则多达 50 个，全国现有贫困人口 8000 万，云南省贫困人口 700 万，而民族自治县中就有 400 万，约占其中的 60%。可见，探讨云南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不仅是加快民族地方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民族团结和稳定边疆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云南经济的腾飞、实现云南省“九五”计划、2010 年远景目标和云南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的需要。

一、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差距

云南的各个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生息繁衍。解放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参差不齐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呈现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的全景。解放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依据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的普遍觉悟程度，采取不同的方式，有步骤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认真贯彻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民族地方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以 1978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省民族自治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2.6 倍，粮食产量增长 94.3%，甘蔗产量增长 5.7 倍，钢产量发展到 4900 吨，发电量达 180.5 亿千瓦时，一批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公路通车里程增长 11 倍，财政收入增长近 4 倍，医院病床增长 20 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长 16.5 倍，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自治地区的经济更是蒸蒸日上。1995 年同 1978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6.7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过去 26 年的 2.5 倍。财政收入增长 8.3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6.5 倍，粮食产量增长 41%，发电量增长 3.6 倍，公路通车里程增长 1.2 倍，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使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如沐春风。

然而，由于云南省自治地区基础差、起点低、生产力落后，就其社会发展状况来说，尚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和全国自治地方的平均水平。1995 年底，云南自治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408 元，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1820 元，其中人均工业总产值 1022 元，人均财政收入 141 元，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5 元，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81 元，每万人拥有 23

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和 17 张医院病床，而同期全省平均水平则分别为 3024 元、2496 元、1798 元、246 元、926 元、822 元、28 名和 21 张。可见，两者的差距仍然十分悬殊，加快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迫切。

二、发展经济必须走开放与强化自身造血功能相结合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各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差异明显，以至于体现在生产、生活方面，发展经济方面，生产技能创新、改造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靠传统的生产方式、耕作习惯进行生产，会使土壤老化，种子退化变质，形成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化，思想意识的僵化。等、靠、要的思想长期困扰着部分民族兄弟，虽然党和政府对他们十分关心爱护，但要全面顾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确有很多难处。首先改变其生产生活环境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财力，先进的技术在当地难于传播，外因条件具备了，可内因条件不能适应，形成了改造自然的屏障。其次，一些兄弟民族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曾经历了历史的跨越，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统禁锢和影响，生产、生活一直在很低的层次上运作，要迅速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生产技能，是一件长期的工作。然而就在这些地方，办学条件最差，国家对他们的教育投资也有限，许多村寨至今还没有一所小学，少数民族儿童求学困难重重。再者，很多少数民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深山老林，水、电、路不通，生活较为原始，生产粗放，靠天吃饭，生活保障性差，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贫困时时困扰着他们。在一些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有一部分农户房屋简陋，家产折合人民币不到 100 元，生活饱一餐饿一餐，自己也不想下地干活，形成了一种懒惰、等待政府救济的思想。从此可看出，少数民族群众对发展经济要有强烈的意识，要有改造自然、战胜自我、学习先进的生产管理技

术、培养乡土人才、适应科技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增强自身的发展和造血功能，更要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利用好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吸引外资、外商和国际友好组织的投资和无偿援助，在与外商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互惠互利原则，另一方面也可学会一些国外的先进管理技术、激励机制和一些科学决策方法，一个产业的发展可以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人才，这无疑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只有提高民族自身素质，才会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劲。只有与外部经济紧密联系，才能有强烈的竞争机制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面临着十分特殊的条件，在全省宏观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少数民族地方经济，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这种状况决定着民族地区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自觉改造主、客观世界，立足本质，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和科技意识，积极拓宽对外经济联系，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参与世界经济合作，逐步完善竞争和激励机制，学会科学的管理方法，制定一系列繁荣经济、吸引人才的举措，注意培养本民族的科技领头人和基层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克服不利条件，走出一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路子。

三、实现云南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由于民族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程度不同，交通、信息闭塞，缺乏大批现代的科技管理人才，经济发展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相比差异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解决贫困民族兄弟温饱问题，缩小与内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

差距，必须对贫困民族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实现云南省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和优势自然资源，强化支柱产业，以增加收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特别是要把反贫困当作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来对待。其主要对策和措施是：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省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的党政领导，要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转变思想观念，冲破过去产品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认识的束缚，认真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等有关指示精神，从改革与开放这两个侧面认真探索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道路，因地制宜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源，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带领各族人民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积极发展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教育事业，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民族地区经济要从根本上振兴，教育和科技始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因素。而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又寓于教育之中。为此，一是要增加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走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而财政又是投资主体的办学道路；二是要以特殊的办学形式切合民族特点，尽量创办寄宿制学校，并把成人教育中采用的函授办学形式引入中等教育；三是以灵活的教学手段培养多层次人才，要以技术培训为诱因，以实用技术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寓知识教育于生产实践之中，通过各种专业培训来造就大批多层次的人才，其中特别要注意提高各级干部的水平，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四

是制定吸引人才的优惠条件和措施，大力吸引各类人才到民族地区工作。发挥科技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引进和推广各民族迫切需要的实用技术成果；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发挥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群众团体等单位的智力扶贫作用，开展技术咨询和指导，参与各项经济技术决策，建立技术试验、试范推广基地；三是重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三）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群。民族地区经济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基础差和结构单一，因此，要实现地区倾斜为产业倾斜并重，促进民族地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计划有重点地建立起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群：第一，建立和发展以生物资源开发为重点的优势产业群；第二，建立以水电为主体的矿电优势产业群；第三，建立民族地区原材料工业优势产业群；第四，以粮经和乡镇企业为核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旅的全面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抓住机遇，按照省政府的布置，抓紧研究各地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云南“18生物工程”的带动下，使民族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要坚持以农为主，农工商一体化路子，办好绿色企业，实行种养加相结合，发挥老企业的龙头作用，创造出—条市场促企业、企业联农户的高效发展路子。

（五）以旅游业为龙头，推动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景观异常丰富的优势，以旅游业为龙头，实行以文化牵动“人流”和“物流”的发展方式，从而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首先要切实保护并完善现有名胜旅游景点；其次，要开发一批新的旅游点，如丽江旅游区、怒江旅游区、沧源南滚河热带雨林旅游区等；第三，完善

旅游服务设施，对旅游服务质量要加强监督；第四，根据市场需求大力组织轻工、手工、美术工艺等部门开发旅游商品，为游客提供物美质优的旅游商品。

（六）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适合当地边贸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充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发展壮大边疆地区的经济实力。广大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边境线长、与周边国家接壤方便的区位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地启动边境贸易和国际贸易，并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引导各民族人民加入经济国际化的行列。

（七）全面认真地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促进边疆稳定。主要包括：

1 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尊重和保障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2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三级结构，使各层次发挥组织经济的职能。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应实行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的结构。无论其行政级别高低，均享有民族自治权，形成既相互隶属、又相对独立的关系网络和纵横交错的组织层次，依照本民族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至第三卷
2. 《云南省 1995 年、1996 年统计年鉴》
3. 《云南省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 谢 韬

市场经济与扶贫开发

十几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主要是放在扶贫即救济和扶助贫困人口解脱经济困境上。经济开发工作尤其是大规模开发活动也在开展，但力度不够，成功的经验也不多。因为当前农村贫困问题主要是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经济开发、如何致富的问题。经过不断努力，现在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余的到本世纪末也将基本得到解决，这意味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开发和发展为中心的新时期。如何进行经济开发，尤其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开发，日益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现实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下世纪初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和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一切经济工作包括社会经济的运行、调节和管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手段的运用等都将围绕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来进行。扶贫开发工作作为社会经济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必然也要受到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制约和支配。

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和方式。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可以说它是商品经济的更高形式，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经济组织和管理制度的总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的运行和调节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即市场机制来进行，并受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所约束。市场经济一般包括价格体制、供求机制、风险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内容，而市场经济规

律主要指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主体利益规律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等基本规律。社会经济的组织和管理，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是指各种市场主体，如企业的内部经济组织和经营管理。宏观层次则指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企业主体作为具有明确产权关系及独立权益的市场主体，其经济行为是以市场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自主性行为，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组织，其经济调控以间接手段为主，并通过协调市场的方式对企业行为进行引导。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上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可充分发挥市场与计划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实行更有效的经济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不断增强，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扶贫开发行为市场化。其实质是，一切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目的的扶贫开发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等价交换。目前的扶贫开发行为基本上是一种计划行为，突出反映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主要是依据贫困地区（县）的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程度，从上到下逐级分配中央和省、自治区安排的扶贫开发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指标，然后由各贫困县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情况，向上申报扶贫开发项目和资金。上级扶贫开发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审批项目和资金时，主要以当地经济情况和政府意见为主要参考依据，而不是以项目今后的市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衡量。这样往往导致批准上马的扶贫开发项目因产品难以打开市场而失败。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要求我们在对具有社会经济效应的扶贫开发项目进行取舍和安排资

金时，要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从主观需要来考虑问题。这样不仅现行的扶贫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作根本性的改革，而且从扶贫开发的模式到具体方式，从扶贫开发项目的经营到管理，都需要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扶贫开发活动的社会化。尽管我国现在全社会都在普遍关心和支持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困问题，并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去，但这带有浓厚的群众性和行政活动的特点，还不是一种社会化活动。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开发活动的社会化是指通过市场纽带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把社会各界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各方面力量逐步投入到扶贫开发事业中，而且这些投入是自愿的、互惠互利的行为，不带有任何强制性。能做到这一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就不会是一时一地的个别行为，而是全社会的长期和普遍行为。这里关键是要解决如何提高贫困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使之有利于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事业。可见，扶贫开发活动的社会化与扶贫开发行为的市场化密切相关，是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第三，扶贫开发项目经营企业化。这是市场经济对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或经济组织的经营行为要求。扶贫开发项目从经济性质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如农田水利、道路、电力等建设项目，这类项目往往投资大、工期长且经济效益不显著，过去主要是作为以工代赈项目由财政出资兴建；另一类是种养业、加工业等经济开发项目，这类项目一直被视为能够帮助贫困农户尽快脱贫致富的“拳头”项目或“支柱”项目，因而也是各地竞相申报投资的热门项目。在市场经济下，投资项目按照企业化经营本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由于受传统投资体制的影响，投资责权利相互脱节，加之扶贫开发项目往往成为贫困地区政府部门追求经济增长的关键项目，所以在项目投资和生产经营过程中行政性的干扰较大，导致投资损失浪费、投资效益和生产